

後西方時代 (Post-Western Era) 來臨： 中國文化創新現代化，與西方並駕齊驅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2025年10月23日在封面標題為「勝出貿易戰」“Winning the Trade War”，內文刊兩篇專題文章，一篇題為《中國利用美國貿易武器擊敗美國，它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找出美國的弱點並減輕自己的弱點》，稱中國7年前被特朗普「卡脖子」的境遇下，反思自身技術短板，並系統性地籌劃了如何應對。如今，這種戰略遠見使中國在貿易戰中佔據主動，中國通過反制措施，成功迫使美國多次讓步，標誌其正在塑造新的全球貿易規則。

另一篇題為《為什麼中國正在贏得貿易戰？它挫敗了美國的攻勢，並改寫了全球貿易規則》的文章說，當特朗普重返白宮，對華貿易提高關稅及高科技貿易管制。然而，半年多過去，中國在被脅迫下仍輕鬆自在，並在反制時表現出高超的技巧，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實力深厚。一年間中國對美出口下降了27%，但貨物出口總體仍增長超過8%，顯示中國利用自己作為「全球最大製造國與70多個國家最大貿易夥伴」的地位，已重塑貿易規則。

此外，《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在2025年10月31日發表《中國成為美國勢均力敵的競爭對手》“China Emerges as US ‘Peer Rival’ at Xi Jinping-Donald Trump Summit”，指出在韓國舉行的峰會上，習近平對特朗普表示：「我始終認為，中國的發展應該與您『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願景齊頭並進。」在這些客套話背後，兩人之間的力量對比變化顯而易見。這次，準備更加充分、經濟實力更加強大的中國，已經能夠與曾經遠比自己強大的對手展開一場勢均力敵的較量。

自從2025年9月中國大閱兵及10月習特會面

後，西方評論方向不再以假消息抹黑中國，轉為向事實低頭，承認中國長期的現代化奮鬥已達到與美國平手的地步，正挑戰數百年西方壟斷的規則。

這顯示百年未有變局來臨，中國正在創造一個「後西方時代」(Post-Western Era)，一個「中國文化創新現代化模式，與西方並駕齊驅的時代」(China's Innovative and Modernized Model of Culture is on Par with the West)。

所謂「西方」，是指一個大文明圈，根源於希臘、古羅馬及中世紀到現代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經由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啓蒙時代、科學革命、工業革命、民主自由政制及資本主義，發展出現代西方文明。近代西方發展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侵佔其他民族文化，掠奪全球資源，擴張為全球化的操控，形成當今世俗化的西方世界。冷戰時期，美國領導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深受自由主義思想影響，形成反對共產主義的陣營。到蘇聯崩潰後，美國成為超強，領西方列強獨霸世界。西方日裔學者福山(Yoshihiro Fukuyama)以為於西方所創的制度，是人類最高的理想，人類歷史的前進至此正走向「終結」。

然而近年美國地緣政治上的過度擴張、持續在全球引發戰爭、預算赤字不斷加大、欠債超過收入可還、道德及家庭價值崩潰、社會上吸毒泛濫、情慾放縱、罪惡橫行。兩大民意機構聯合調查(Axios-Ipsos Poll)，在2021年國會大廈騷亂後，進行了民意調查，其中79%的受訪者表示美國正在「分崩離析」(falling apart)。這都使美國迅速減弱全球信賴的領導力。

美國華裔文化人郭怡廣(Kaiser Kuo)是著名

歷史學家郭廷以的孫兒，2025年在通訊平台 The Ideas Letter 發表《大估算：西方應該從中國學到什麼》，他引述經濟史學家亞當·圖茲 (Adam Tooze) 研究中國後曾對他說：「中國不僅是個分析對象。... 它更是理解現代性最關鍵的鑰匙。」圖茲稱中國是「人類歷史上組織化程度最高、且未來也難以企及的現代化實驗場。」郭怡廣指出：「我們目睹的不僅是另一強國的崛起，更是對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認知——關於發展模式、政治體制乃至文明成就本身——的根本性挑戰。」「對美國人而言，更深層的心理衝擊在於：他們終於意識到現代性已非他們獨創、僅被他人繼承的產物。這個敘事已然過時。」

他進而指出中國創新的發展模式，本來自中國文化，「思想史學家約瑟夫·列文森 (Joseph Levenson) 在其鉅著《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1958-1965) 中指出，中國的追求在於尋找一條既具中國文化特質，又具有客觀有效性的富強之路。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始終在研究這一難題：如何實現現代化而不喪失文化認同，如何變得強大而不放棄中國的獨特性。這段歷史或許即將結束。中國似乎已尋得這條道路。支撐其成功的體系是一種複雜的融合思想——結合了儒家思想、列寧主義、技術官僚主義、國家主義與市場機制。」

筆者同意他所言，中國改革的成功，在實踐地逐步建立了一個人類歷史上的新融合文明，是中西方三個重要文化思路的共融及互相平衡：

1) 中華文化的價值精神，肯定宇宙有正道、天地有正氣、人性有惻隱仁義、交往須和諧共贏、商道求義以生利、管治講經世致用、尋求天地人和合創進、以開萬世之太平。

2) 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精神，掌握社會發展的規律、追求生產力解放、人民實現自身創造力的解放、立根現實作實踐檢驗、建立社會正義、消除兩極分化、公平共富、消滅剝削的社會。

3) 資本市場經濟的價值來自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所言的清教徒精神，尋求富裕是天職、倫理上持守誠信公正、交易時遵守契約、管理重工具理性、效率重程序問責、全社會講法治、累積財富後回饋社會。

中國在多線實踐的發展中，融合中西文化的精神價值，摸索出 21 世紀有效運作的發展道路，建立了一個全過程民主的賢能政治體制 (Meritocracy)。這制度根源於古中國的治道，其現代化的發展來自革命到改革長期的摸索，發展到如今成為一新的賢能政治體制模式，以區別於西方的模式。

當今的賢能政治，建立為協商民主制度，最高權力機構人民代表大會由選舉產生，截至 2020 年底，全國共有人大代表 262 萬名，其中縣鄉兩級人大代表佔代表總數的 94.5%。即中國 94.5% 人大代表是縣鄉直選出來的，植根人民，再由這基礎互選而選拔出更高的市、省及全國人大代表，每一全國代表都有長期實務經驗，不是靠口才或宣傳，是按賢能被選拔並且由政協監督，而「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除它們派出的代表機關和在非黨組織中的黨組外，都由選舉產生。」各方賢能者被引進參與討論國家或地方的政策發展。

加拿大學者貝淡寧 (Daniel A. Bell) 指出「賢能政治是指政治制度的設計旨在選拔那些能夠做出符合道德判斷、能力超群的政治領導人。」「孔子認為，賢能政治始於人人受教的假設。然而，並非每個人都能通過這一過程獲得同等的道德政治判斷能力。因此，政治體系的一項重要任務是選拔具有超乎尋常的道德政治判斷能力的領導者，並鼓勵盡可能多的人才參與政治。在孔子看來，這樣的統治者才能贏得人民的信任。」

這賢能政治與西方體制不同，但又達至成功，確是一個「後西方時代」的運作，世界將進入一個「中國文化創新現代化模式，與西方並駕齊驅的時代」。